

李浪 朱艳杰 / 著

『西琴』东渐与本土艺术

四川省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

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钢琴教育的传入与发展；下编为川北“王皮影”。上编深入地厘清中国钢琴教育的发展脉络，结合中国钢琴教育取得的成就，探讨它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向，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编以川北“王皮影”为个案研究，以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为主，从历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视角，结合川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用图片和文字相结合的表达方式，运用“白描”手法力图再现川北“王皮影”的历史。

The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Piano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Art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四川省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

『西琴』东渐与本土艺术

李浪 朱艳杰 / 著

The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Piano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Art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琴”东渐与本土艺术 / 李浪, 朱艳杰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097 - 6303 - 2

I. ①西… II. ①李… ②朱… III. ①钢琴 - 音乐教育 - 研究 - 中国 ②皮影戏 - 研究 - 四川省 IV. ①J624. 1 ②J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9262 号

“西琴”东渐与本土艺术

著 者 / 李 浪 朱艳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玉敏

责任编辑 / 王玉敏 张文静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出版分社(010)59367243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3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303 - 2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上编 中国钢琴教育的传入与发展

绪 论	3
第一章 钢琴在明清时期的传入与发展	6
第一节 传教士与皇帝	6
第二节 商品、学堂与乐歌	9
第二章 近十五年中国钢琴教育的发展	15
第一节 逐渐摆脱束缚	15
第二节 钢琴教育纵深发展	16
第三节 理论研究水平提高	32
第四节 积极参加赛事,捷报频传	35
第五节 社会钢琴教育方兴未艾	42
第三章 钢琴教育的多元化与民族化	58
第一节 民族化过程中的努力	58
第二节 民族化的缺失	62
第三节 如何才能民族化	63

下编 川北“王皮影”

绪 论	71
第一章 川北“王皮影”的历史	87
第一节 川北皮影戏的源流	87

第二节	“王皮影”所在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	107
第三节	“王皮影”的发展历史	108
第二章	“王皮影”的艺术魅力	120
第一节	“王皮影”的制作程序	120
第二节	“王皮影”的造型、色彩	124
第三节	“王皮影”的剧本创作	135
第四节	“王皮影”的音乐唱腔	140
第五节	“王皮影”的表演操作	144
第三章	“王皮影”的民间习俗	149
第一节	皮影的表演场合及剧目	149
第二节	日常习俗	159
第三节	皮影戏的传承与发展	171
结 语		175
附录 A	访谈资料	178
附录 B	王文坤口述资料	199
附录 C	“王皮影”剧本	203
附录 D	相关报道	261
附录 E	皮影的收藏与识别	269
附录 F	历史名人影戏诗赞	274
参考文献		276
后 记		283

上 编

中国钢琴教育的传入与发展

绪 论

文化与教育须臾不可分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教育活动的开展。就钢琴而言，要发展中国的钢琴文化，首先要关注中国的钢琴教育。

中国早期的钢琴教育与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以及中国“学堂乐歌”的兴起关系甚密，它们为中国的钢琴教育事业搭建了平台。明清时期传教士的活动使中国民众特别是皇族对钢琴有了初步认识，伴随着以传教士为主要教学力量的学校音乐教育与私人教学形式的出现与发展，钢琴教育由此兴起。继维新变法后，“维新思想”促进了国人对新制学堂及教学模式的重视，钢琴作为“学堂乐歌”的辅助角色在新型学校的音乐活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并在此过程中逐渐为中国的普通民众所接受和熟悉。钢琴作为外来文化通过各种教育形式逐渐与中国的国情相融合，形成了基于华夏文化底蕴的中国钢琴文化。

纵览 20 世纪的中国钢琴文化，在钢琴教育、钢琴作品创作、钢琴理论研究、中外交流和钢琴制造等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在所有领域中，钢琴教育无疑是促进各领域深入发展的根本环节，钢琴各领域的人才均需以钢琴教育为直接或间接途径来培养。因此，关注中国钢琴事业，应首要关注中国的钢琴教育事业。

对于中国的钢琴教育，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侧重于钢琴演奏技巧、曲式分析、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探讨，谈教育的不多。已有的关于钢琴教育的论文，大多是在钢琴课程的范畴内探讨具体教育方法的问题，涉及教育史的内容不多，其中卞萌的《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华乐出版社，1996）、李卓的《当代中国钢琴教育二十年》（天津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0）、宫莉的《山东省高师钢琴教育发展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 2009) 等论著可供参考。而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曾晓安、杜学元编著的《中国钢琴教育的回眸与展望》一书, 是我国第一部钢琴教育通史性的著作。它以时间为经, 事件为纬, 对我国钢琴教育的历史做了较为详细的回顾, 部分还原了当时钢琴教育的具体实况, 并把钢琴教育的发展、变迁等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时空加以分析, 揭示了我国钢琴教育发展的规律性。但此书也有明显的缺陷, 如史料单薄、论证缺乏依据、资料堆砌过多, 特别是对各大院校的情况及教学团队的介绍占了相当大的篇幅。

对于本编第三章讨论的中国钢琴教育发展的民族化问题, 相关论文也有不少, 诸如颜咏的《关于钢琴教育民族化的思考》(《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蔡俊超的《中国钢琴作品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运用》(《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步玉琴的《中国钢琴作品在高校教学中的必修地位》(《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高峰莲的《中国钢琴教育走向民族化应从启蒙教育入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S1期]、韩佩君的《“琴韵”——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教学与演奏》(《中国音乐》2004年第2期)、张静薇的《浅谈钢琴创作与教育民族化的必要性》(《内蒙古艺术》2007年第2期)、白丹的《中国钢琴音乐教育技术化与民族化的必然性研究》(《大家》2010年第23期)、杨树的《中国钢琴作品创作的民族化进程和对钢琴教育民族化的思考》(《乐器》2009年第6期)、肖静宇的《中国钢琴教育的民族化问题初探》(四川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06) 等, 可见钢琴教育民族化问题为众多学者所重视, 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不少文章对民族化欠缺的表现或原因都进行了阐述, 有的还将其归类, 并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认识, 如颜咏的《关于钢琴教育民族化的思考》一文对影响中国钢琴教育民族化的原因进行了较好的分析, 作者认为主要原因为“民族化钢琴作品的缺乏制约了钢琴教育的民族化”, “忽视民族化钢琴作品在实际音乐教育中的运用, 阻碍了钢琴教育的民族化”, “钢琴启蒙教育的西化, 也是中国钢琴教育民族因素匮乏的原因之一”。韩佩君的《“琴韵”——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教学与演奏》一文认为当代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教学现状及薄弱环节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钢琴曲的演奏学习重视程度不够; 二是中国钢琴曲演奏学习的选择范围相对狭窄; 三是中国钢琴作品的教学和演奏不得要领, 使音乐表现苍白无力, 内涵不够。这些研究成果对本书都具有启

发意义，但已有的研究总体上表现为：存在的现状多、分析原因少；发现问题多、解决问题少。

因此，深入系统地厘清中国钢琴教育的发展脉络，总结我国钢琴教育取得的成就，探讨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向，不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编的研究力求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中国钢琴教育发展史上的三个坐标点——初期、近十五年的情况、未来的可能趋势——来探究数百年来中国钢琴教育的巨大变化、存在的问题，并厘清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脉络。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一是重视实证研究，运用原始文献，力争做到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二是强调实地调查，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工作地与钢琴教育相关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三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注重中国钢琴教育内部不同时期的变化，中西钢琴教育的共性与异质，寻找中国钢琴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适合中国国情又能走向世界的可能路径。

第一章 钢琴在明清时期的传入与发展

钢琴艺术迄今已有 400 余年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钢琴从早期的键盘乐器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大钢琴，因其音域宽阔、声音层次丰富而被誉为“乐器之王”。作为一种舶来品，钢琴何时传入中国及在中国遭遇了怎样的命运无疑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现在的研究大多是把西洋乐器在中国的传播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钢琴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专题研究的为数甚少且失之简略。^① 本章拟对明清时期钢琴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做一史实重建，并在此基础上厘清它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脉络。

第一节 传教士与皇帝

据现有的史料，钢琴最早传入中国是明朝万历年间。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二十一日，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觐见万历皇帝。所献礼物中就有“西琴”：

……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径趋阙廷，谨以原携本

① 可资参考的论文主要有吴相湘《西洋音乐东传记略》，《大公报》史地周刊，1937 年 2 月 19 日；陈迁：《西洋乐器的传入和在我国的的发展》，《乐器》1985 年第 4 期；萧友梅：《键盘乐器输入中国考》，《中国音乐》1993 年第 3 期；王柔：《西洋音乐传入中国考》，《音乐研究》1982 年第 2 期；杨乃济：《乾隆朝宫廷西洋乐队》，《紫禁城》1984 年第 4 期；汤开建：《16-18 世纪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洋音乐家考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 年第 3 期；汤开建：《明清之际西洋音乐在中国内地传播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 年第 2 期；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五册，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3，第 1~22 页；魏廷格：《古钢琴和钢琴究竟何时传入我国》，载《魏廷格音乐文选》，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第 166~167 页。

国土物，所有天帝图像一幅，天母图像二幅，天帝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舆图一船，西琴一张等物，陈献御前……万历二十八年题具。^①

对于利氏所贡之西琴，其后都有不少记载。如明代万历年间曾任云南布政司右参议的冯时可曾记载：

余至京，有外国道人利玛窦……道人又出番琴，其制异于中国，用铜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以小板案，其声更清越。^②

清代的《钦定续文献通考》则对此琴的形态、属性等情况做了较为细致的记载：

明万历二十八年，西洋人利玛窦来献其音乐。其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棊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③

根据对它的形状和发音原理的记载，我们可以初步判定此时的“西琴”应当是古钢琴中的击弦古钢琴，即“克拉维科德”（Clavichord）。对于这个贡物，神宗皇帝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据利玛窦所记：“万历二十八年，岁次庚子，窦具贽物，赴京师献上，间有西洋乐器雅琴一具，视中州异形，抚之有异音。皇上奇之……”^④于是就命令四名太监向与利玛窦同来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Pantoja, Didaco de, 1571 ~ 1618）学了一个月弹奏法。^⑤这四名太监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古钢琴学生，而庞迪我可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古钢琴教师。

其后，明崇祯十二年（1639），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 1582 ~ 1649）进呈崇祯帝“西琴一张，风簧一座”。^⑥次年，德国传教

① 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233页。

② （明）冯时可：《蓬窗续录》。

③ （清）《钦定续文献通考·乐考·乐器·丝之属》卷一百十。

④ [意]利玛窦：《西琴曲意·小引》，见《畸人十篇》，《天学初函》康熙乙亥本。

⑤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286~288页。

⑥ [比]鍾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二册《毕方济奏折》，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年影印本。

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 ~ 1666）在明宫制作新琴未能成功，但修复了先前利玛窦进献的西琴，还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古钢琴构造与演奏方法的《钢琴学》。^①

至清代，顺治十三年（1656）荷兰使臣献古钢琴一架。^② 到康熙时，西洋乐器传入宫廷者渐多。康熙帝本人也对包括钢琴在内的西洋乐器有着极大的兴趣。据法国传教士费赖之（Louis Pfister, S. J., 1833 ~ 1891）的《1522年至1773年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著述提要》记载，康熙十五年（1676），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 1645 ~ 1708）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 ~ 1688）拜见康熙帝，康熙帝曾命徐弹奏宫中古钢琴，即拨弦古钢琴，并弹奏了中国曲调。^③ 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帝召见徐日升与 Grimaldi（疑为 Gherardini），命他们“用以前赠送给皇帝的风琴与古钢琴演奏”。^④ 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清内宫暖阁见“西洋乐器，种种清响”，在渊鉴斋又见“西洋铁丝琴一架”。其间，传教士还在宫廷内仿制钢琴。《蓬山密记》就有“内造西洋铁丝琴，弦一百二十根”的记载。^⑤ 这一时期，徐日升还担任了康熙皇帝的音乐老师，教授皇帝西方乐理和古钢琴。据《蓬山密记》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也就是在师从徐日升的三十年后，康熙皇帝还能在古钢琴上弹奏中国古琴曲《普庵咒》。这不仅表明了康熙皇帝有相当水平的弹奏技巧，还表现了把中国乐曲应用到西方键盘乐器上的能力。

康熙四十七年（1708），徐日升去世。三年之后，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 1671 ~ 1746）接替了徐的工作，担任了宫廷乐师。当时德理格觐见康熙帝时，康熙帝曾命他演奏古钢琴以测试他的音乐水平。^⑥ 后来德理格不仅展示了他的音乐演奏才华，还以《律吕正义·续编》著名。到乾隆

① [德] 魏特：《汤若望传》（第一册），杨丙辰译，商务印书馆，1949，第24~28页。

② [荷] 包乐史、庄国士：《〈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第51页。

③ Louis Pfister, S. J.,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22 - 1773, p. 382. 转引自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第35页。

④ [葡] 若埃尔·加良：《徐日升：17世纪在中国皇宫的葡萄牙乐师》，《文化杂志》（台湾）1988年第4期。

⑤（清）高士奇：《蓬山密记》，古学汇刊本。

⑥ [意] 马国贤：《清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甫回忆录》，刘晓明译，《紫禁城》1989年第1期。

时，包括钢琴在内的西洋乐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清宫造办处档案的记载，乾隆时宫中配置有西洋乐队、铁丝琴（古钢琴即为其中的一件乐器）。^①

十分遗憾的是，国人对钢琴的喜好，仅仅发生在万历、康熙及乾隆等少数帝王身上，其作用与影响非常有限。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后，清政府厉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外交流的大门也随之关闭。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钢琴才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重新流入中国。

第二节 商品、学堂与乐歌

晚清七十年，列强入侵，民族危亡。随着时局的变化，钢琴在中国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 钢琴在宫廷

此时，钢琴作为宫廷的“玩物”不再受到人们的注意，只有零星的记载。据海瑟琳·卡尔《慈禧写照记》一书的记载，光绪皇帝喜欢外国进贡的“批雅拿”（piano），并能抚弄自如，“帝悉能在乐器上，模之成调，与原音酷肖”。慈禧太后也颇喜欢听音乐，观赏乐师弹琴及跳舞。据卡尔的记述：“朝堂之后轩，有外国批雅拿三具。有一具最大，新由外洋运到者。太后极愿予辈挥弦一试。于是裕庚女公子二人，各为之歌一再行。即阕，太后又命予往试之。予遂亦为之抚弦操动移时，太后又请裕庚女公子，按琴声而舞。二公子遂作德国之二人旋舞，以娱太后。”^② 据宫中档案记载，逊帝溥仪在少年时，颇爱音乐，常于读书之暇，演琴吟曲。为学习西洋风琴、钢琴，他曾聘虎坊桥关记琴行主人关善亭为教员，每日教琴一个小时。一段时间过后，溥仪就能用钢琴弹奏一些中西乐曲，演奏也日臻熟练。现在故宫博物院清宫藏品还藏有当时唯一遗留下来的一架钢琴。^③

① 杨乃济：《乾隆宫廷西洋乐队》，《紫禁城》1984年第4期。

② [美] 海瑟琳·卡尔：《慈禧写照记》，陈霆锐译，天津市古籍书店，1989。

③ 在1988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末代皇帝宫内生活展览”，在文物展品中，有一架通体黑漆的钢琴，台面长1.82米、宽1.57米、高1.003米、前盖长1.25米，是一个名为约翰的英国人制造的。它是清晚期外国进献的礼品，也是故宫博物院清宫藏品中唯一遗留下来的一架钢琴。见毛宪民《明清皇宫的西洋乐器》，《文史知识》1993年第10期。

二 钢琴成为商品：外国人的发财梦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鸦片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① 1844年，中法签订了《黄埔条约》，法国获得了在五口通商口岸建造教堂的权利。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美、英、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使以上四国获得了在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咸丰十年（1860），中法签订《北京条约》，法国获得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权利。^② 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西方列强均获得了建教堂、传教的权利。这些传教士及其家人的到来、教堂的建立加速了钢琴在中国的发展。而这一时期，西方的音乐由先前的巴洛克时期进入了浪漫主义时期，古钢琴也被现代钢琴替代。

鸦片战争前，钢琴还只是宫廷的“玩具”，随着列强的侵入，一些英商对中国市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企图在输入鸦片的同时，也圆一笔钢琴发财梦。“一个极著名的商行向华输出了大批钢琴。”^③ 更有商人根据欧洲钢琴的普及率及其销售经验推测：“只要每十户中国人平均能买一台钢琴，那么，人口众多的中国，必将是个十分巨大的钢琴销售市场。”^④ 1850年，英国商人 S. Moutrie 还在上海开办了中国最早的琴行——“谋得利”琴行。^⑤ 除销售琴外，兼营修理业务，后进口零件雇工装配。^⑥ 但由于当时中国国门打开不久，在华外国人数不多，教会与西洋学校开办的也少，对钢琴的需求量很少，再加上当时的中国经济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外国的洋货尚代替不了中国的本土产品，其销路也就可想而知。但随着沿江沿海开放口岸的增加，外国在中国建立教堂数量的增多以及外国传教士的纷至沓来，对钢琴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1870年（也有称1875年），英商见钢琴销路较好，便在上海设立中国第一家钢琴制造工厂——“谋得利”上海钢琴有限公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3页。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

③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第18页。

④ 转引自卞萌《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华乐出版社，1996，第7页。

⑤ 余甲方言这是簧风琴，见余甲方著《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8页。笔者认为所言理由并不充分。

⑥ 陈迁：《西洋乐器的传入和在我国的发展》，《乐器》1985年第4期。

此公司负责制造和销售钢琴等乐器，工厂建在闸北的宝山路，毗连上海商务印书馆。^①

三 教堂的开设和教会学堂的兴办：钢琴在中国的应用与推广

钢琴在中国的应用与推广，除了商人的活动外，更与教堂的开设和教会学堂的兴办密不可分。

每逢礼拜，教徒都会在教堂咏唱“圣诗”，而用钢琴或管风琴伴奏成为教堂音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形式也吸引和影响了不少中国人。这一时期，教会学堂也开始建立，到1899年，全国的教会学校约2000所。^②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39年欧美基督教教会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堂（1842年迁入香港）、1845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建的崇信义塾、1849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徐汇公学、1861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在上海建立的清心女塾、1874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圣芳济书院、1892年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中西女塾等。这些学校普遍设有音乐课，有的还专门开设了钢琴课程。^③

钢琴课教师通常是外国传教士，教学水平普遍不高。尽管如此，这些教会学校还是培养了一批音乐爱好者，其中一部分人，如在中西女塾就读过的史凤珠、李虞贞、王瑞娴等后来还出国深造过，回国以后，为中国的钢琴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这一时期的教学内容有以宗教为中心、西化的特点，没有形成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音乐教育，但它是中国近代音乐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开端，对其后学堂乐歌和中国创办音乐教育产生了显著影响。^④

四 国人初出国门的钢琴视野

自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初出国门，钢琴也成了他们的描述对象。1859年，中国天主教徒郭连城随意大利传教士赴罗马，后著有《西游笔略》一

① <http://hi.baidu.com/pianoteck/blog/item/a4459f00ed6bcf87e850cd72.html>, 2010-08-25.

② 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教育大辞典：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第10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126页。

③ 陈净野：《李叔同学堂乐歌研究》，中华书局，2007，第7页。

④ 陈应时、陈聆群主编《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227页。

书，此书对他在赴欧船上听到的钢琴有记载：“有英国商妇弹洋琴者，其琴名必亚诺（按：piano 的音译），复依声歌之，声清雅，连弹三曲，客必鼓掌称善。”^① 1866 年，外交官张德彝在上海记下了他对钢琴的见闻：“洋女拨弄洋琴，琴大如箱，音忽亮忽细小，参差错落，颇觉可听。”^② 从中不难看出他悟出了被称为“强弱琴”的钢琴的特点。外交官曾纪泽在出使的国家还学习钢琴弹奏，据他所著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一书记载，他在国外“试学钢琴甚久”，“饭后学钢琴”。^③

据现存的史料，中国人到国外对所见钢琴的外形与琴内构件的最早描述是李圭。1876 年，李圭（1842～1903）作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赴美国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后著有《环游地球新录》。此书的相关记载反映出李圭对在博览会上所见的“大洋琴”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和赞叹：

大洋琴一座，高方各二丈许，木为之，若斗屋。内皆机关弦索，外置一案一机。案面启，则音律牌排满其中，弦索由案底达室内。琴师坐而鼓之，大声铮铮然，若金戈铁马，小声切切然，若儿女私语，能使听者忘倦。每日必鼓数曲，合院数十国人皆赞叹不置。旁又有如长案半桌者多具。琴师甚文雅，偕观之，特为主再鼓一曲，惜非知音人，未免辜负美意耳。闻西国文士多工琴，而德人称最，故制琴之法亦最精。^④

项文瑞（生卒年无考），在东渡日本讲习师范、考察学务的过程中，对日本的学校音乐教学做过悉心考察，“观音乐教室，凳长七尺，以两凳连接为一列，共五列。左右置大小两琴，师弄大琴，学生皆依琴声而歌”。^⑤

客观而言，这一阶段，初出国门的中国人虽对西方钢琴的认识是肤浅的、零碎的，但开启了国人深入了解西方音乐的渠道。

①（清）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② 转引自何丙仲《一灯精舍随笔》，载政协厦门市鼓浪屿区委员会编《鼓浪屿文史资料》（第 7 辑），音乐专辑，第 29 页。

③（清）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第 422 页。

④（清）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4，第 217～218 页。

⑤（清）项文瑞：《东游日记》，载张静蔚编选《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第 86 页。